

『福建与海洋』

系列丛书（第一辑）

丛书主编 ◎ 杨国桢 高健斌

闽在海中

杨国桢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福建与海洋』

系列丛书（第一辑）

丛书主编 ◎ 杨国桢 高健斌

闽在海中

杨国桢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在海中/杨国桢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8.3
(“福建与海洋”系列丛书/杨国桢，高健斌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334-7547-5

I. ①闽… II. ①杨… III. ①海洋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福建—文集 IV. ①P74-53②F127.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9768 号

“福建与海洋”系列丛书 (第一辑)

丛书主编 杨国桢 高健斌

Min zai Haizhong

闽在海中

杨国桢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25 网址：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0591—83716932
发行部电话：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邮编：350002)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69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7547-5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总序

201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与我探讨，希望能策划一套丛书，我毫不犹豫地建议以“福建与海洋”为主题。之所以有此建议，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作为我国东南沿海省份，福建海岸线漫长，沿海岛屿众多，又因为西北部武夷山脉的阻隔，从远古先民开始，就选择了向海洋进发，开展了大量水上活动。在闽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后，海洋活动同样层出不穷，留下了大量海洋文化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历史文献记载。在研究海洋文化方面，福建省无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其次，从学术界的动向看，近年来学术界大有反思和研究，以杨国桢、吴春明等学者为首，大力呼吁重视海洋文化的研究，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海洋文化研究开始摆脱“大陆文明中心”的学术立场，确立“海洋人文”的学术视野，并慢慢摆脱了边缘地位，开始登堂入室。

再次，从国家与社会的大气候看，随着人类社会迈进21世纪，海洋越来越受到重视。“海洋强国”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海洋文化已经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海洋文化的学术课题开始持续出现在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中。我们认为，这种对海洋文化的重视将会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大趋势。

天时、地利、人和，都摆在面前。这种时机，作为福建的学术研究者，作为福建的出版机构，毫无疑问一定要牢牢把握。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在他们的努力下，“福建与海洋”丛书选题得以通过。作为一套开放性的丛书，其中第一辑五本专著，经福建教育出版社申报，被列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对于整套丛书，我们的定位是基础性的全面研究项目，涉及海洋聚落考古、沉船考古、港市历史、海防体系、传统舟船与民间造船法式、航路

体系、海洋宗教信仰、海洋渔家、海洋移民、对外交流、海洋石刻等领域。总体的思路是：在学者们已开展过较高水准研究的领域，希望能在对原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提高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原来不为人重视、未开展研究或研究水平尚有较大提高余地的领域，拟通过全面的田野调查、文献搜集，言人所未言，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

希望通过我们这套丛书，将福建在海洋文明史中的独特和重要地位，较为全面且较为新颖地展示出来。争取做到这一套丛书出版后，能作为福建省情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出福建的文化大省、文化强省风采，另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向社会各界提供准确的信息。

我们深知，这一目标的实现，绝非易事，但同时，我们也对实现这一目标充满信心。我们深信，通过各位学者的努力，“长风破浪会有时”，一定能看到“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成功。

高健斌

2017年5月

前言 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

1998年，为了纪念国际海洋年，我曾将历年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的文章编成《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一书，收入我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的《致读者》中，我作了这样的说明：

“闽在海中”，这是《山海经》对福建的描述。《山海经》为周秦间人所述，西汉末刘秀校定，许多资料源于远古传闻。遥想远古时代，在黄河流域创造农业文明的先民们，遇到了从南方海上漂航而来的族群，得知这些称为“闽”的人，住在海的深处。海洋的神秘，也使僻处海隅的闽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岁月流逝，留下的只是“闽在海中”的社会记忆。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闽人是一个航海的民族。

闽是“蛮”的别种，在族群互动中先被整合入“百越”族系，终融合于汉族中。秦置闽中郡，汉武帝平闽越，特别是晋、唐间北方汉族移民大举入闽，移植中原文明，福建成为中国新开发的农业区域之后，沿海地区以汉族为主体的闽人接受、吸收原住民的海洋发展传统，在中国海洋的舞台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为塑造中世纪的中国海洋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6世纪以后，在西方海洋势力东进的大背景下，福建的海洋活动又滋养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文明因素，步履艰难地向近代转型。现代，海洋与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在新世纪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的大潮涨起之时，福建人将以新的观念和气魄，勇敢地走向海洋，走向世界，为重塑中国海洋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于是乎，“闽在海中”的涵义，拓展为福建海洋发展生命的生生不息，福建人对新的海洋时代的憧憬和追求。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福建海洋发展在历史漏斗中留下的记录，只是少数为上层社会所关注的事件和人物。老百姓海洋活动的历史大多被淹没，只有一部分成为社会集体无意识的传统传承下来。

它们未走入学术殿堂，是非主流文化，因而也绝少为学者阐扬，鲜为世人所知。随着海洋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的加重，本世纪初以来，泉州海外交通史、福建海外贸易史、华侨华人史、海关史、海港史、海防史、造船史、渔业史、海军史、闽台关系史以及蒲寿庚、郑成功、施琅、林则徐、严复、陈嘉庚、黄乃裳等海洋人物，妈祖、吴真人等海洋民间信仰的研究，受到学界的重视，并取得可观的成果，从不同侧面发掘了一些湮没沉睡的史料资源，丰富了人们对福建海洋传统的认识。然而，这只是沧海之一粟，冰山之一角，要厘清福建海洋发展史的全貌，仍有艰巨的工作要做。

十多年前，我开始试图从古籍和散藏海内外的民间文献中，寻觅历史隧道里“闽在海中”的片断倩影。涉猎之余，曾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和书刊上献刍荛之言，得到海内外朋友的鼓励和指教，推动我把学术视野转移到海上，增添了探索的信心和勇气。近两年来，我承担的福建海洋发展史研究课题，被列入“九五”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任务是从不同角度、侧面对福建民间海洋活动做进一步追寻拾遗。历年案牍所积，都是专题的探究，重心放在15世纪末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涉及经济、航路、移民、社会、人物五个方面，大多是前人注意较少或未曾接触到的问题。从福建海洋发展史来看，它仅仅是苍茫碧海溅起的几点浪花，并非“闽在海中”的全方位描述，这是必须申明的。

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顾福建海洋发展的往昔，我们知道的不是很多，而是太少了，仿佛仍在雾里看花。大力搜寻海内外收藏的各种福建海洋人文社会信息，解开历史的“失忆”，开发时代和社会所需要的海洋文明因素，还是一项艰辛的任务，解读“闽在海中”，势必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在这层意义上，这些文稿也就具有文化累积的意义。

于是，我把它们集成一册，献给走入大海洋的新时代弄潮儿们。

该书所收的文章，最早发表于 1980 年，最迟写于 1998 年，虽然相隔的时间较长，但都是我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福建海洋发展史有关的著述已出版不少，但留下的空白和迷惑也多。一是由于传统的史书缺乏记载，需要另辟史料来源，而考古发现、公私档案、地方和民间文献、海外汉文图书的搜集整理、遗俗遗制的田野调查，需要积极提倡和呼吁；二是历史学原本的学科设计没有考虑到海洋的因素，历史学涉海研究的，分散于通史、断代史、地区和国别史、专门史等分支学科之中，缺乏以海洋为本位的意识，需要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所以试图从遗存的档案、地方志、民间文献、航海针经、宗教仪式中，去追寻福建海洋发展的人文信息，对福建的海洋发展模式、海洋经济区域和海洋航路的变迁、内陆地区参与海洋发展、航海与移民活动、海洋与沿海民间社会，分别作专题性的探究，提供若干历史场景或个案，从不同角度揭示福建与海洋的关系，解读其中的内涵，凸显中国海洋人文史料资源的意义和价值，为开拓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海洋社会人文研究的发展空间提倡新的思考。因为其中的一些资料和问题从前很少有人注意，于是显得特别珍贵，记录下来就有文化积累的意义。

进入 21 世纪，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仍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福建的海洋发展走上快速路，进入新阶段。2004 年，福建实施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战略；2006 年，提出把“海峡两岸旅游区”建成全国旅游合作示范区；2012 年，提出加快海洋经济发展，打造“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强省，成为深化两岸海洋经济合作的核心区、全国海洋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重要基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区、全国海湾海岛综合开发示范区、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和创新海洋综合管理试验区。2013 年，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国家战略；2015 年，福建被批准启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被确定为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这一宏大规划带动的伟大实践，是前无古人的，需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体制创新，同时也需要借鉴福建海洋发展历史的经验。

198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十年研究规划项目，1990~1991 年组织跨国合作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不断扩展，被誉为东西方之间海洋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成

为海洋中国、海洋东南亚、海洋印度、海洋伊斯兰等的互通互补、和谐共赢的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的历史符号。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宋元时代，泉州崛起为中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外交往的重要始发港，成为海洋伊斯兰、海洋印度、海洋东南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中国的主要终点港，这是福建海洋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沉淀的海洋文化资源和历史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是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文化优势。

其次，新世纪的福建海洋文化和海洋历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乏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力作，但总体而言还是滞后的。福建海洋文化的特色被归纳为闽南文化、妈祖文化、海丝文化、闽商文化、船政文化等，但在学术界并未取得共识，总让人感觉缺乏总体的把握，有点以偏概全。福建海洋历史的研究，随着域外汉文海洋文献的公开与外文海洋文献的翻译出版、本土考古发现、民间海洋文献发掘整理和田野调查的拓展与深入，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不少新领域有待进一步开发，需要研究者扎实实地推进。

历史和文化既相联系又有差别。虽然文化是可以构建的，但应该建立在坚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上，而用现代人的文化观和自己的构想改造史料，是不可取的。一些文化学者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拼装出美丽的海洋故事，却经不起学术的推敲。比如，有一种时尚的说法称“闽是周初的大方国”、闽人是“周朝周边较为强大的族群”，这是于史无据的。根据现有的古文献和考古发现，闽人以及后来的闽越人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迟于东夷族群的莱夷与百越族群的吴、越，春秋战国时闽越国的海洋文明水平落后于鲁、吴、越三国，属于“第二方阵”，说福建是“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明的发源地”，虽然用心良苦，却有夸大之嫌。又如，为了树立“闽商是中国各大商帮中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最具商业精神，且极具海洋个性的商人群体”的光辉形象，为打造闽商文化品牌，不顾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海商活跃的事实，宣称明清两朝“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唯有闽商维系着中华文明中海洋文化的基因与血脉”，甚至于把“闽人三十六姓”移民琉球说成是“闽商出使琉球古国”，把琉球王宫首里城遗址说成是“闽商创造”的世界文化遗产，把郑成功的水师当成福建商人的军队，把驱荷复台说成是“以闽商的力量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等等，都对历史作了

过度的阐释。以此为基点建构的理论体系和历史论述，是随意将史料放大拔高形成的空中楼阁。

这使我深深感到，历史的解释固然可以与时俱进，然而历史事实的再发现或重建，却不能用自己的理论和观念随意剪裁，过去已有“实用史学”“影射史学”的深刻教训，必须引以为戒。今天我们在研究不足、缺乏实证积累的情况下进行海洋文化建设，如果不在深化研究上下功夫，即便投入巨资的重大工程，也只能是一厢情愿，难以收到经世致用的功效。秉持求真求实的原则，我仍坚持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的学术路径，应先做理论和实证的专题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做综合的研究。

2013年，福建教育出版社计划出版“海洋与福建”的系列丛书，拟通过学者对福建海洋文化开展全面的田野调查、文献搜集及专题丛书撰写工作，将福建在海洋文明史中的独特和重要地位全面展示出来，并为此调查学界研究状况，组织稿源，做了扎实的前期准备。2013年10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孙汉生和社科图书编辑部主任黄珊珊，来厦门征询我的意见，并提出将《闽在海中》修订再版，为这套丛书铺垫。我表示热烈的支持，并阐述了上述看法，得到他们的认可。于是，我着手将1998年后至2012年间发表的论文12篇补入《闽在海中》。2014年6月，向福建教育出版社提交了电子版。2015年5月，根据出版社编辑对电子版审读的意见，由博士研究生刘璐璐、李广超、杨志光、章广、王小东、朱勤滨对录入的书稿重新校对。

现在回头看，组织这套丛书很有必要，用扎实的史实展示福建与海洋的关系，可以满足投身于建设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广大读者的知识需求，可起到正本清源、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

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虽然探讨的内容比初版有很大的扩展，提供了一些新材料、新认识，填补了某些空白，但对浩瀚的海洋而言，还是这句老话：“我们知道的不是很多，而是太少了，仿佛仍在雾里看花。”研究中国海洋发展史永远在路上。王国维先生说过：“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这也是我现在的心境，敬祈读者方家不吝指教！

目 录

前 言 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	I
一、经济编	
第一章 福建海洋发展模式的历史选择	3
第二章 宋元泉州与亚洲海洋经济世界的互动	13
第三章 东亚海域漳州时代的发端：明代倭乱前的海上闽南与葡萄牙（1368~1549）	29
第四章 17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 Hambuan 文书试探	61
第五章 16~18世纪福建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	102
二、航路编	
第一章 东西洋航路与福建海洋发展	125
第二章 明代闽南通琉球航路史事钩沉	138
第三章 明万历年间福建通日本航路	144
第四章 从民间道教科仪书看清代闽南出洋航路	150
三、移民编	
第一章 唐荣诸姓宗族的整合与中华文化在琉球的传播	161

第二章	明代发展中琉友好关系的漳州人	178
第三章	跨越海洋的传奇：琉球久米陈氏家族史研究	192
第四章	汀州客家的海洋性移民	220
第五章	张化孙遗迹探寻记	231

四、社会编

第一章	明初永宁卫筑城的时间与影响	247
第二章	崇武城防与明代海防	258
第三章	葡萄牙人在 chincheo：16 世纪海洋史的一件公案	265
第四章	籍贯分群还是海域分群：虚构的明末三邑帮海商	280
第五章	海盗与海洋社会权力：以 19 世纪初“大海盗”蔡牵 为中心的考察	289

五、人物编

第一章	郑成功与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	307
第二章	隐元禅师与仙岩	333
第三章	林鍼与《西海纪游草》	339
第四章	被动对外开放与徐继畲的学术转向	346

一、经济编

第一章 福建海洋发展模式的历史选择

福建是一个海洋省份，这不仅是因为它有3300公里长的海岸线，面临着辽阔的太平洋海域，而且，从历史上看，它的盛衰一直与海洋社会经济的消长休戚相关。远瞻未来，福建只有抓住时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有自己特色的海洋发展模式，才能赶超国内经济强省，进而跻身于亚太经济之强的行列。

海洋发展的内涵极为丰富。从发展空间来看，它不仅指海洋上的大气、海面和海底，即“内太空”，还包括海岸带、领辖海域的岛屿甚至内陆腹地的“海内发展”和以海外国家、地区为对象的“海外发展”；从发展的组织行为来看，它不仅指发展生产力的海洋产业和海洋科技，还包括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及其运作所结成的种种关系，乃至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因素，由此构成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人文三个层面。海洋发展的模式，就是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人文互动组合的方式。

海洋发展的模式是动态的，这与海洋的运动形式一样，会出现波浪起伏，但决不会停止。福建海洋发展模式的历史演变正是如此，它的未来趋势也应是如此。

一、海洋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生活在福建沿海地区的古闽人和闽越族，属于海洋民族。海岸采拾贝类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前，海洋漂航发源甚早。以海为生、习水便舟的习性，铸造了“闽在海中”的形象。移民入闽的汉族，在与闽越族的族群互动中成为福建民族主体之后，闽东南海岸带便逐渐形成“以海为田”的海洋发展模式。

“以海为田”，即把大海比喻为农业社会的田地，把海洋捕捞、海洋交

通运输作为生存的根本，就像陆地的农业一样。这是以农耕为本的汉族人民面对海洋环境的适应性选择，它采借、吸纳闽越族的传统而具有海洋性，体现了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汉唐之际，海洋捕捞是福建“以海为田”的主体，海洋交通运输方面主要是中原王朝与南海朝贡国之间的中转。从事海洋活动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渔民、疍户、船工、篙师。受海洋发展的刺激，沿海地区开发加速，造船业、海盐业兴起，东冶等港口形成港市，农业以围海造田的形式向海洋延伸。

以海洋捕捞型为主的发展模式，是最古老最普遍的海洋经济形式。这是处于早期开发的福建沿海人民，对海洋发展的合理选择。

五代以后，“以海为田”从海洋捕捞型为主向海洋运输、海洋商业型为主转换。导致这种结构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沿海社会经济变迁因应了海洋发展大势，抓住了机遇。

从唐末开始，西太平洋沿岸与印度洋沿岸由海路联结成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中古东方世界的海洋贸易圈。五代闽国开甘棠港，积极“招徕蛮夷商贾”^①，单独发舶南海、新罗、日本，使福建的海外贸易加入“丝绸之路”的循环运作。宋代把“通洋裕国”列入国策，在官方鼓励下，“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②，造船航海技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闽船、闽贾活跃于东西洋上。南宋末至元代，泉州超越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互动的枢纽。海洋商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商品化倾向的扩大，闽南成为我国中古海洋事业鼎盛时期最活跃的区域。区域人文中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性格，妈祖崇拜等海洋神灵系统的建立，标志着海洋发展模式转换带来民间文化的升华。

明代海洋政策从积极转向保守，福建官方的海洋活动除通琉球外，在郑和下西洋后戛然中止。民间的海洋活动在海禁的重压下，一部分转向农业或“陆地渔场”的水产养殖，更多的则以非法形式冒险“通蕃贩货”或移民海外。原有的海洋交通运输、海洋商业扭曲为体制外的循环，和海外移民一起组合为海洋发展的主要形式，海洋捕捞趋退，但由于水产养殖的

^①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八《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② 苏轼：《东坡奏议》卷六《论高丽进奉状》，宝华含盒刻本。

补充，海洋渔业保持平稳且略有发展。这种体制外的运作，客观上推动了福建民间海洋力量的成长，月港、安海、梅岭等辟成港市，弥补了泉州衰落出现的空缺，在传统的东西洋贸易圈内散布闽籍海洋移民社会网络，因应“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海洋势力闯入东方传统贸易圈的挑战，与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发生互利互动关系。沿海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自发作出的这种选择，说明以海洋交通运输和海外贸易、海外移民为主，以海洋水产为辅的发展模式合乎福建省情，合乎世界海洋发展潮流，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正因为如此，明代后期月港开放，郑氏海洋性地方政权崛起，“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①，闽南再次成为中国海洋发展的中心，而台湾与闽南连成一体，最终成为福建的一府。

清代前期，福建沿海在经历了迁界浩劫之后重新开海。在有限制的多口对外通商时期，厦门是福建通洋正口；改为广州一口贸易之后，厦门仍保留着南洋贸易的特权。“贩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市，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舵水人等借此以为活者，以万计。”^② 闽南人从偷渡到争得合法，大量移至台湾，进入高潮。移民台湾和南洋贸易是此时福建海洋发展的主轴。

明清两代，随着海洋活动从官方向民间的转移，福建沿海“民业全在舟贩”，“多赖海市为业”^③，“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蕃为命”^④，“浮大海趋利，十家而九”^⑤，海商、海盗、渔民、海洋性乡族、宗教信仰等社会组织得到传承和强化，区域性的海洋人文传统传播台湾和海外。但是，由于民间海洋活动长期得不到国家支持，甚至受到打击和破坏，福建海洋

^① 周起元：《东西洋考序》，载张燮：《东西洋考》，谢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② 周凯：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

^③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四〇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④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二，《明实录》影印本，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

^⑤ 李光缙：《景璧集》卷一四《二烈传》，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